

陈新 彭刚 主编

HISTORY & THOUGHT

历史与思想

第一辑

“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 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陈新 彭刚 主编

HISTORY & THOUGHT

历史与思想

第一辑

# 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 第1辑/陈新, 彭刚主编.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1  
(历史与思想)  
ISBN 978-7-308-12867-4

I. ①文… II. ①陈… ②彭… III. ①史学—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9722号



历史与思想 第1辑: 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  
陈新 彭刚 主编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王雪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640mm × 960mm 1/16  
印张 15  
字数 168千  
版印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2867-4  
定价 54.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 《历史与思想》编辑部成员

### 主 编：

陈 新 浙江大学

彭 刚 清华大学

### 编 辑：

岳秀坤 首都师范大学

郭晓东 复旦大学

邓志峰 复旦大学

章益国 上海财经大学

### 海外编辑：

艾柯·鲁尼亚 (Elco Runia)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埃娃·多曼斯卡 (Ewa Domanska) 波兰密茨凯维奇大学

斯特凡·约尔丹 (Stefan Jordan) 德国巴伐利亚科学协会历史委员会

### 英文编辑：

朱绩崧 复旦大学

## 《历史与思想》学术委员会

何兆武 清华大学

刘家和 北京师范大学

于 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刘北成 清华大学

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耶尔恩·吕森 (Jörn Rüsen) 德国埃森文化科学研究所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 (Frank Ankersmit)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阿兰·梅吉尔 (Alan Megill)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启真馆出品

## 弁 言

我们身在历史之中，要清楚自己处境、行为的可能与不可能，少不了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抽象与概括，形成某种解释框架来定位自我、评估自我、设计自我。我们的历史研究，不论是当前那些似乎有各自的边界并获得独立命名的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等，还是在近代欧洲开始分离并追求独立发展阶段的学科史，如哲学史、文学史、史学史、艺术学史、社会学史、政治学史等，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历史的名号。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过：历史记载具体事件。如果历史是具体的、特殊的，历史的意义又如何表达呢？具体的、特殊的东西对于读者而言若不能被认同而获得普遍性解释，它便永远外在于读者。历史的意义可以通过对事件细节的直接描述便传达给读者吗？姑且不论我们的口述和书写过程中必然运用各种作为抽象结果的概念，历史经验的表达从来都包含了对普遍性的追求，否则历史意义无法实现。例如，我们现在知道，要想从历史中获取意义，两种基本的有效方式：一是叙事，对诸事件进行逻辑上的归纳和概括，得出结论，告知读者；二是叙事，等待读者

在阅读时结合自我的日常经验进行类比，自我领悟。它们代表两种基本的历史表现风格。前一种叙事，作者替读者完成了概括；后一种叙事，作者提供例证让读者自行概括而得其义。不同的读者会按各自的阅读偏好评价不同的叙事风格。不过，我们对历史的任何概括，或者想令其发生效用、实现意义，都是奠基在对有限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抽象之上，任何历史结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即没有人能够对达成这个结论的充分必要条件进行完全表达。

然而，逻辑上的不可能并不能否决我们在实践中对历史的需要。就算历史只是古希腊意义上的“有用的意见”而不是那个只在理想之境中存在的“真知”，我们也常常运用历史来证明、定位、定向。或许“永恒的真知”也只能在每一个“现在”时刻才能获得作用和效果，因而成为时间掌控下的“真知”。历史从来如此，它正是由此获得了不间断的生命力。

我们这本读物，以“历史与思想”命名，还因为我们希望提供一个跨学科的交流平台。我们相信，唯有在思想的层面，不同的学科、同一个学科中的不同领域，交流的效率才可能得到提升。

在人文、社科的众多学科领域中，学者们努力处理各自学科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观看或参与各个学科与生活世界的信息交流。对于学者们而言，生活世界中的变幻会不断生成令以往自我认知不能解释的现象，或者说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这种情形恰恰为不同学科术语的借鉴、交换、融通提供了场所。我们在借鉴、交换、融通过程中构成思想层，一个立足于差异和特殊却努力寻求认同和普遍的场所。与此同时，既然每一个学科领域都不得不重视其学科史，并且以重写学科史的方式赋予自我理

解的现实以合法性，那么，现实的思想获得历史的维度与历史的思想获得现实的维度，就构成了一切历史皆为当代史和思想史的交互说明。

不同的学科史写作，可否运用共同的历史性思维？不同的研究领域，是否会面对共同的现实性问题？不同的研究者，有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研究主题，会不会受制于共同的表现策略和限度？只有存在共识，我们才可能交流，而我们也曾看到，人类的求知过程，总是表现为突破旧的共识、塑造新的共识。为此，我们希望这里可以提供不同学科或研究领域之间不断寻求共识的场所。一切都在历史中，一切都在流变中。常与变、静与动的辩证法正是我们的思想每时每刻都在力求领悟的。如此，我们不妨以历史为名，以思想为名，传递我们在流变世界中的点点薪火。

## 目 录

### 专 论

- 3 关于文化记忆理论  
扬·阿斯曼
- 26 评述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  
金寿福
- 63 余波与“先声”：历史与人类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
- 109 文化历史主义再思考：一条从布克哈特延续至今的系谱？  
埃里森·摩尔

### 评 论

- 151 “深描细写”与生产关于近代中国的历史知识：  
以《新史学》为中心的讨论  
潘光哲



## 书 评

- 181 评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吴铮强
- 200 评吕妙芬《孝治天下：〈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  
赵四方
- 211 评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  
周建漳
- 221 评杰克·古迪《西方中的东方》  
张正萍

专  
论



# 关于文化记忆理论

扬·阿斯曼（海德堡大学埃及学研究所）

金寿福 译

## 内容摘要：

本文的宗旨是界定和澄清文化理论所涉及的几个概念。首先，文化记忆分别与文化理论和记忆理论相关联，文化记忆理论的最大长处就是其兼容性。其次，文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人类为了适应和改变环境的过程；另一方面是为了构筑各具特色的群体并在生者与死者之间建立联系而进行的各种活动。文化记忆主要指后一种活动，正是借助于这种记忆，一个人的所思所想不再局限于自己从生到死的基础数据，而是超越这一限度，确认其在时间长河中的具体位置。再次，人的记忆可以分为三个维度，即个体维度、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文化记忆所关注的是记忆的文化维度。从记忆的媒介来说，个体记忆和交流记忆是借助肉身进行的，而文化记忆则是借助象征性的客体来完成的。借助文字、符号、图画等符码进行的记忆所涵盖的时间范围

巨大，所以它能够发展成为文化记忆。人在这个世界生存需要两种记忆，一种是短时段之内的交流记忆，另一种则是长时段之内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满足了人类的身份欲望。最后，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以文化理论为指导，划清经典与档案之间的界限会有助于我们正确对待日益增多的知识并选取和保存必不可少的那一部分。

我在题目中使用了“文化记忆”（kulturelles Gedächtnis）这一主题词，但在文章中主要是阐述由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与我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对被称之为文化记忆的研究活动和理论作一个宽泛的介绍。<sup>[1]</sup> 我们开始文化记忆这项研究的初衷是消除概念上的含糊不清。就目前来说，文化记忆这个表述形式已经成为一个时髦词，它所表示的意域宽窄不一，确定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显得尤为重要。<sup>[2]</sup>

达到概念上的统一，第一步是要加以区别，因为文化记忆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具有两个不同的方面，它既可以用在

---

[1] 请比较：Aleida Assmann, *Erinnerungsräume: Formen und Wandlungen des kulturellen Gedächtnisses*, München: Beck, 1999;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an der Millenniumschwelle. Krise und Zukunft der Bildung*, Konstanz: Universitätsverlag Konstanz, 2004; “Memory,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in: Robert E. Goodin, Charles Till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textual Political Analy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10-224; Jan Assmann,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München: Beck, 1992; *Religion und kulturelles Gedächtnis*, München: Beck, 2000.

[2] 可以参看：Astrid Erll, Ansgar Nünning (eds.),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8; *Medien des kollektiven Gedächtnisses. Konstruktivität - Historizität - Kulturspezifität*,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4. 关于文化科学领域的记忆研究，读者可在下面书中获得简明扼要的介绍：Astrid Erll, *Kollektives Gedächtnis und Erinnerungskulturen*, Stuttgart/Leipzig: J. B. Metzler, 2005.

文化理论 (Kulturtheorie) 的范畴之内, 也可以用在记忆理论 (Gedächtnistheorie) 的领域中。在文化理论范畴中, 它专门指代文化的记忆功能, 从而有别于文化当中与记忆关系不大的功能或方面。在记忆理论领域内, 这一概念特指记忆中的文化方面, 即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中受制于文化的记忆形式, 因此有别于个体和集体记忆中文化色彩并不明显的记忆形式和功能。我们并不认为, 文化在整体上就是一种记忆, 同时也不认为, 记忆完全受文化的支配或由文化建构而成。我们所理解的文化记忆理论是一种文化理论, 同时也是一种记忆理论, 所以, 这个理论的长处就是它的兼容性。

假如从文化理论的视角考察文化记忆, 如同洛特曼 (Lotman) 和乌斯潘斯基 (Uspenski) 一样, 我们会很自然地把它看作人类无法 (以生理的形式) 继承的记忆。<sup>[3]</sup> 在自然界中, 动物们借助身体中的基因结构, 并且通过代代相传即由父母传授的方式获取适应环境求生存的必要技巧和能力, 而人类则必须而且能够通过象征性的符号与各种视觉和听觉的符码传承相关的知识和能力, 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语言。所不同的是, 人类不仅传承这些知识和能力, 而且能够积累和丰富它, 因此可以在文化上得到进化, 以惊人的速度超越自然所赋予人类的本能。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两大区别: 首先, 我们不仅生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 而且置身于不断改善并充满象征意义的思想世界中; 其次, 我们人类埋葬自己死去的同胞, 而且知道自身也有终结的那一天。以前的文化理论非常强调人类适应环境和借助文化统治世

---

[3] Juij M. Lotman, Boris A. Uspenskij, *The Semiotics of Russian Culture*, Ann Arbor: Department of Slav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4, p. 3.

界的方面。<sup>[4]</sup>按照这种理解，人终究还是智人 (*homo faber*)，即不断地生产越来越精致的工具，从石斧到今天的手提电脑，而且谁也不知道将来还会出现什么新玩意儿。因为手与大脑相互配合，日益复杂的工具被制造出来，随之而来的是人类愈发广博的认知能力和与此相关越来越充分和专门化的知识，人借助它更好地适应自然和宇宙的变化。在这里所涉及的文化技巧 (*kulturelle Techniken*) 和文化功能 (*kulturelle Funktionen*) 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是人类共同生活中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组织和管理任务，诸如供给、交通、管理、安全、娱乐，等等。上述内容乍看上去包含了现代文化的各个方面，但事实上，文化的实质远不止于此。

如果我们回溯人类历史早期，文化中的另外一个方面曾经占据显要的位置，即懂得要埋葬死去的同胞，意识到自己生命终结的那一天。<sup>[5]</sup>这里所涉及的不是适应环境，更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在远远超出自己生命范畴的过去和将来之间确定自身的位置，更加直白一点地说，就是知道如何与死者或者说来世打交道。作为生活在今天的人，我们并没有感觉到上述文化功能应当占据我们生活中的核心位置，似乎这个问题并没有无可比拟的紧迫。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在一般的文化理论中应当处于可有可无的位置，而只是说明，现代文化 (*Gegenwartskultur*) 失却了它本应

---

[4] 比如：Michael Tomasello, *Die kulturelle Entwicklung des menschlichen Denkens. Zur Evolution der Kognition*,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2002; Merlin Donald, *Origins of the Modern Mind: Three stages in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A Mind So Rare: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onsciousness*, New York: Norton, 2001.

[5]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我的两本书：*Der Tod als Thema der Kultur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1, *Tod und Jenseits im Alten Ägypten*. München: Beck, 2001, J. Assmann, R. Trauzettel (eds.), *Tod, Jenseits und Identität. Perspektiven einer kulturwissenschaftlichen Thanatologie*, Freiburg/München: K. Alber, 2002.

有的平衡。在上面所讲的文化两个方面之间，现代文化的重心严重倒向了与技术 and 积累相关的方面，而涉及死者和来世的方面则受到了忽略甚至忽视。从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的整体来衡量，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化的第二个方面具有超越个体寿命的长远意义，能够帮助人在时间维度中自我调整，因此与第一个方面一样应当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原始动力（Ur-Impuls）和每个人的基本需求（Grundbedürfnis）。

我们在探讨文化理论时所使用的文化记忆之概念特别强调上面所说的文化的第二个方面。毋庸置疑，文化的第一个方面即技术进步的方面也离不开记忆，因为科技知识的传承和积累必须依靠表现为信息储存和管理的记忆形式。假如没有记忆，人类只好不停地重新发明车轮，而基于第一次发明之上的继续发展则无从谈起。尽管记忆在我们借助科技适应环境和改善生活的方方面面必不可少，但是它在这些领域只是起到了辅助的、工具性的和促进的作用。而文化的第二个方面，情况则大不相同，记忆在此完全占据核心位置。正是因为借助文化而形成并制度化的社会记忆（soziales Gedächtnis），人死后依然存留在他生前所属的集体之中，每个人与自己的祖先保持着联系，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记忆，一个人的所思所想不局限于自己从生到死的基础数据，而是超越这个限度，确认自己在上下数千年的时间长河中的具体位置。宗教的雏形本来就是对死者尤其是祖先的祭奠。祖先对后世来说具有典范意义，个体和集体的生活实际上都自然而然地以祖先为榜样，而神话则为深不可测的时间赋予了可以叙述的形式。借助于此，死亡和其他生命的秘密不再是不可避免和必须逆来顺受的事件。效仿祖先和为他们奉献供品是一种记忆活动，同样，



讲述和倾听神话也是记忆的表现形式。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建议用文化记忆这一概念特指并局限在文化的第二个方面。

文化记忆当然不局限在祖先崇拜和神话层面。所有与祖先崇拜和神话相关并基于此演变而来的现象都属于文化范畴。希腊人把记忆拟人化，称之为摩涅莫辛涅（Mnemosyne），而且以她为核心建构了神谱，视其为九个缪斯的母亲。希腊人用摩涅莫辛涅这一形象特指文化记忆，不仅用九个形式或方面加以细化，如舞蹈、戏剧、诗歌、历史书写，而且把它们托付给九个缪斯。<sup>[6]</sup>我们认为，以上由九个缪斯所掌管的领域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宗教、艺术和历史。显而易见，这三个方面均发源于祖先崇拜和神话的编写及讲述活动，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演化出了诸多不同的类型（Gattungen）、科目（Disziplinen）和功能（Funktionen）。<sup>[7]</sup>

文化记忆最为原始的表现形式是为死者举行的墓葬和献祭仪

---

[6] 这里为了便于读者回忆而赘述，克里奥（Klio）主司历史，墨尔波墨涅（Melpomene）司悲剧，特耳（尔）西科瑞（Terpsichore）司合唱和舞蹈，塔利亚（Thalia）司喜剧，欧忒耳珀（Euterpe）司抒情诗和音乐，埃拉托（Erato）司爱情诗，乌拉尼亚（Urania）司天文，波吕许墨尼亚（Polyhymnia）司颂歌，卡利俄珀（Kalliope）司史诗、雄辩术、哲学和科学。希腊人用上述几个方面表述了文化中与记忆相关的部分。宗教不在其中，没有哪个缪斯专门司宗教仪式，但是在许多宗教活动中，由特耳西科瑞、欧忒耳珀和波吕许墨尼亚主管的合唱、舞蹈、抒情诗、音乐（吹笛）和颂歌起到了多方面的作用。

[7] 假如我们能够达成共识，认为有必要在上述两个原始动力或者文化发动机之间加以区别，那么必须同时承认，在每个具体的、实际存在的文化当中，二者有各种各样交叉的情况，以至于我们很难决定把文化的特定方面如哲学归在第一个功能之下还是归在第二个之下。苏格拉底把哲学称为“死亡训练”（Einübung ins Sterben），显然把哲学归在文化的第二个方面。哲学探讨的是如何正确和使用有关死亡的知识。怀特海把西方哲学定义为对柏拉图的注脚，指出了哲学研究的记忆性质，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具有类似祖先崇拜的特征。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哲学具有其他特征，即它使用的概念及解释模式愈来愈精细，简直成了可供“智人”使用的工具，它的定义超出了人类认识自身和适应世界的认知功能。不过，这并不等于我们应当放弃上面所强调的区分。恰恰相反，哲学这个具体的例子再一次说明了文化的两个方面，即借助技术获得进步和通过回顾进行调整即回忆。